

第一章 绪 论

赵国,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七雄’之一,曾经屹立于我国历史舞台二百余年之久。她幅员辽阔,兵多将广,是当时除强秦之外的山东六国中数一数二的强国;她的历史悠久,国脉绵长,其可考的直系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及少昊氏族的时代;她的文化蕴积丰厚,多姿多彩,是众多诸子学派及文史杂艺的诞生地,其可资借鉴和为后人称道的文化掌故俯拾皆是。当年司马迁为先秦各主要诸侯国作著《世家》,其所作《赵世家》在各诸侯《世家》中竟占了最长的篇幅。今天,生活在故赵土地上的我等后人,回过头来温习与研究自己所居土地上这段辉煌的历史,自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这部《赵国史稿》,仅仅是我们对赵国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初步尝试。为使读者了解我们的写作意图及赵国历史文化的全貌,这里仅就几个问题进行必要的说明。

一 赵国史研究的范畴

一般认为,赵立国的时间应从赵氏家族的赵襄子在位时期算起。襄子即位在公元前 475 年。此年的前一年为周元王元年,即《史记·六国年表》的始年,多数学者亦把这一年作为战国时期开始的年份。而赵国的灭亡,可以公元前 222 年赵公子嘉在代地维持

的政权最终被秦人覆灭为标志。翌年，即秦统一山东六国之年。可以看出，赵国的存亡恰与战国时期的起讫相一致。本书所叙述的赵国的历史，便主要放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包括赵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举凡赵国的建立、疆域变化、其治乱兴衰的轨迹、社会与经济状况、阶级与民族构成、有关典章制度、赋税与土地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皆在本书涉及的范围之中。以上史实的叙述，自主要属于战国史的内容，但有些问题，如赵国王室的继承制度、民族的构成等，由于要追溯它们的由来，也涉及到了战国以前的晋国历史。特别是本书要对赵国的建立者——赵氏势力集团在晋国的成长过程乃至赵氏祖先的渊源进行考察，这方面的历史将一直追溯到夏、商、西周三代乃至更远的传说时代。

极盛时期的赵国，经过赵武灵王的经略，其领土跨越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四个省区以及今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因而战国时期上述地域，皆属我们研究的范围。不过我们研究的重点，仍然放在赵国向来统治的中心区域，它们主要是今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以东的“东阳”地区，今山西中部太原盆地及其以西以东地区，晋北、冀西北一带山地及山间盆地。对于这些地区，我们不仅要指出它们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些地方的领土沿革，还要追溯到它们在三代乃至更远的原始社会时期的人文地理状况。这主要是为了勾画出赵文化赖以生存和发育的生态及人文环境，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赵国历史的文化特点。至于经过赵武灵王经略而后为赵所占领的原中山国和林胡、楼烦所据有的地区，由于它们为赵占领的时间较短，也不是赵国发祥的根据地，我们除了对中山国的建立者白狄及林胡、楼烦这几个少数部族的来龙去脉做一番考证索隐之外，只对这些地方在战国时期的土地归属进行大致介绍。

对于赵国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畴的把握，涉及到对赵文化与赵国的历史文化这两个既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的认识。从时间上讲，赵文化不仅包括赵立国之后的文化，还应包括建国前的赵地居民所创建的文化，甚至赵国灭亡以后赵地的遗风遗俗也可以包含在内。而从空间上讲，赵国历史涉及到的地域又不仅限于人们常常提到的赵文化的分布区域。本书虽名为《赵国史稿》，实际上也兼顾叙述赵成立以前的赵地的历史文化。

有关赵国史资料的搜集，我们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的。众所周知，这些资料应当既包含文献记载的内容，也包含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有关赵国史的文献资料，我们主要采取了《史记》中的《晋世家》和《赵世家》，《左传》，《国语》，《战国策》，《古本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先秦诸子中的零星记载。至于赵国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其较为重要者，可以举出解放前后在河北邯郸调查发掘出的邯郸故城的考古资料，邯郸、永年赵王陵调查与出土的文物资料，邯郸西北百家村、齐村和邢台发现的赵国中小墓葬群的发掘资料、涉县北关赵国贵族墓葬出土有关材料，石家庄市市庄村等地所出铁器资料，太原金胜村贵族大墓，侯马出土东周盟书，以及历年出土的赵国兵器刻辞及货币资料等。此外，70年代河北平山发掘出的战国中山王陵丰富的墓葬资料，也提供了这个长期与赵国打交道并最终为赵所灭的白狄族国家的历史及其族属等情况。所有这些文字记载的与地下出土的资料，都属于我们研究的范畴，是我们借以考察赵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二 赵国史研究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学者认为，近年来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并取得很大成绩的

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少地方的古国史,如秦国史、楚国史、齐国史、吴越史等开展得有声有色,均极大地促进了相关领域的中国古代的断代史或专门史的研究。赵国史研究的开展,无疑也将有助于中国先秦史上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化总体构成的认识。

首先,一部战国史的研究就离不开对赵国史的深入解剖。赵作为战国时期除秦以外的二等强国,无论是其疆域、人口还是其军事实力、战略地位,在列国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赵武灵王以后,赵国的军事力量臻于极盛,《战国策·赵策》记苏秦称是时赵国之强盛云:“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以此实力,赵傲然雄视天下。武灵王曾以赵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隐然怀有“吞秦之志”^①。惠文、孝成两代,赵之威仍“行于天下山东”^②;赵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③。或称赵“抑强秦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④;秦所畏害天下者莫如赵^⑤。至赵国后期,秦赵两国的争胜实际决定着战国兼并战争的最终结局,故而才有长平之战那样空前惨烈的战争场面。凡此可见,对于赵国治乱兴衰及其政治军事举措的研究,很大程度便关乎到了对整个战国局势的把握。

战国时期的赵国号称“四达之国”,处于列国及各少数部族之中心的位置。与之相邻的国家及少数民族,有秦、齐、燕、韩、魏、卫及中山、林胡、楼烦、东胡等,赵大约是当时邻国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度之一。有人统计,作为战国政治外交实录的《战国策》及出土帛书所载纵横家言中,提到赵的地方较其它国家更多。赵国对邻国的关系,不少与当时国际关系间的整体外交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在这方面研究出现的许多问题都牵涉到了赵史上有关事件与

人物，如惠文王时期任为赵相的奉阳君李兑，便是当时列国外交中的一个焦点人物。因此，从深入了解战国时期各国间纵横捭阖的斗争出发，赵国史研究对于把握整个战国史无疑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战国时期“战”字当头，各国军事制度及有关改革理应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各国军事改革的典范，它与秦国商鞅主要在政治上进行的改革，成为战国社会一系列变法中两颗耀眼的明珠。如同商鞅变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自己国家的范围，超出了战国时期的时间范围。作为赵国史研究中重要一环的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研究，无疑也是战国史研究的重要环节。

关于战国诸子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赵国思想文化的范畴。赵国出身的荀子、慎到、公孙龙等人，都是战国诸子中“巨子”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战国儒家、法家、名家的代表。过去，人们在赞颂这些思想家深邃思想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对于培养他们思想的赵国这块土地上丰厚的文化意蕴的挖掘。看来，这也是一个既关乎赵国史，又关乎战国思想文化史的有趣课题。研究战国文化的学者指出，赵文化是当时北方燕赵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有故晋文化的传统，也有着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色，其与东方的齐鲁文化、南方的楚文化、西方的秦文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气质，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战国秦汉时期五彩斑斓的文化全景。这也是我们研究赵国史必须注意到的。

赵国的经济，在战国社会中亦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赵国的商品货币经济，亦可作为战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典型例证。赵都邯郸是当时南北交通的枢纽，并为列国间著名的商业大都会。这里有包括冶铁业、纺织业、制铜业、制陶业、建筑业、玉石加工业等在内

的各种门类的手工业，有像吕不韦那样善于囤积居奇的巨商及卓氏祖先、郭纵那样‘与王者相埒’的巨富。赵国发行的青铜铸币，无论是其发行量还是铸造地点之多，在列国中都是位列前茅的。有统计说，建国后各地出土的东周货币共约七万多枚，而赵国货币即占了其中三分之一。

还有许多可以说明赵国在战国史上重要地位的例子。读者尽可从本书中加以体会，恕不一一赘述。

根据赵国史研究的客观需要，这部《赵国史稿》除战国史外，还涉及到了春秋及其以前阶段的历史。如上所述，赵国的建立者即赵氏势力集团在原晋国有着很长时期发展壮大的历史，他们作为晋国的卿族曾对晋国社会起过很大影响。春秋时期，赵氏家族的赵盾、赵武、赵鞅历任晋中军帅即晋国军政首脑这一重要职务，其任职的时间超过了晋国其它诸卿。赵氏家族中出任晋卿的人员在晋国卿族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晋国史乃至春秋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都是与赵氏祖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赵衰之佐助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赵盾与晋灵公被弑事件之瓜葛，赵武之促成晋楚及各国间的弭兵会盟，赵鞅主持晋国铸刑鼎，又主持伐灭晋国范氏、中行氏之战争，等等。晋国最终出现六卿专政乃至三家分晋的局面，赵氏都是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卿族。至于赵氏远祖在春秋以前的发迹史，也不是游离于古史研究的主线条之外的。学者常称“秦赵共祖”，实际上，秦人的祖先很长一段时间是寄寓于赵氏祖先门下的，《史记·秦本纪》说秦祖恶来之子女防以下几代，至到大骆、非子，皆因赵氏祖先造父之宠“蒙赵城，姓赵氏”。他们共同的祖先皋陶、伯益为佐助大禹治水的古代著名的贤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赵氏祖先实是作为嬴姓少昊氏族西迁的一支活跃于上古历史舞台上的。

三 赵国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以赵国的遗迹遗物及赵国史上个别人物为对象的研究，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1913年《地学杂志》上署名‘可权’的《赵长城遗址》的文章，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一篇有关赵国史的论文。30年代，为配合顾颉刚等人发起的边疆史的研究，张维华在《禹贡》上又发表了《赵长城考》。赵国出身的儒家大师荀子，则是经常被人论及的历史人物。40年代，缪钺、罗根泽等人均有关于荀子的研究文章。1940年，日本原田淑人等曾对赵都邯郸进行过考古调查和试掘，这些调查与发掘的结果后于1954年以《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为题发表在东亚考古学会的丛刊上。上述这些工作，表明建国前赵国史研究已有了零星开展。

建国后，赵国史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开展的仍不充分，只是有关赵国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较明显的进展。1958年及1970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分别对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北城”（位于今邯郸市市区下面的邯郸故城）进行了勘探和部分清理，获得了比40年代初日本原田淑人等的考古调查更新的认识，从而基本摸清了赵都邯郸的总体布局及内部结构等情况。此外，还对石家庄市市庄村、邯郸西北百家村一带赵国遗址或墓葬进行了发掘；在山西省境内，也对早期赵都晋阳进行过勘察。这些，都为赵国史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然而从史学角度对赵国史进行的研究，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却很少有进展。学者间对赵国史进行的探讨，仅局限在长平之战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有限的几个课题上。

对赵国史探索的热潮，是在“文革”后才兴起的。随着历史研究的重新获得生机及各地方史研究的开展，主要是河北、山西两地

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在自己地方史研究上，其它一些地方研究战国历史文化的学者也为赵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义蕴所吸引，许多有关赵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课题渐渐被人所涉及。利用考古资料包括古文字资料来研究赵国历史地理的风气也日渐浓厚。特别是在 1987 年，由河北省史学会、邯郸市史学会、市博物馆联合中国先秦史学会在邯郸市召开的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将赵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会议就赵文化的渊源和内涵、赵国的政治和经济、赵国的思想和人物、赵国的军事、赵国的疆域及赵长城的走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出版了与会学者的论文集（《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可以看出，这些论文的题目已覆盖了赵国历史文化的大部分内容。会议起到了检阅国内赵国史研究学术力量的作用。会议以后，有关赵国史的论文继续不断涌现。初步统计，自‘文革’结束以后至本书结稿前，国内各学术刊物及上述论文集上所发表的赵史论文，包括对赵国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论文约百余篇（见本书附录所列）。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对赵文化的宏观认识，学者间普遍注意到了它的两重性构成这一特殊性质。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将继续论及。对于赵国的政治，也有学者注意到它所包含的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这两重性，并由此论及赵国的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还有的学者论及赵国的官制，这是过去未曾涉及到的。赵国的经济，亦是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人们不仅一般性地论及赵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还专门地讨论到赵都邯郸的经济、赵国的货币及赵国的冶铸手工业等内容。对于赵国大思想家荀子，人们亦更具体地论述到他的政治观、治国思想、富国主张等。此外，如赵氏家族的族源、赵氏在晋国的发展、赵国疆域暨赵长城、赵国的兵器铭刻等，也都摄入了学者研究的视野。

尽管赵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其它一些地方的古史研究相比,尤其是与西方的秦文化研究、南方的楚国史研究、东方的齐鲁文化研究、东南吴越文化研究相比,差距还是不小的。我们在有些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空白。如对赵国的社会结构,包括阶级关系、民族结构的研究,还没有人着手。对赵国的社会生活,也基本无人问津。还有些问题研究得不够深入,如赵国的经济,其中各种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工商管理、交通、关隘、度量衡之类,即使有文章提及,多语焉不详。赵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也未成为学者的专门论题。对于《世本》这本出自赵国史官的先秦时期重要的史学著作,我们不仅缺乏整理,甚至缺乏重视,以致在许多人的文章中都未曾被提及。特别是我们至今未有一部真正的赵国史或赵文化的学术专著,没有人从事对于赵国历史文化的全面系统的梳理工作。所有这些,都有待日后学者的共同努力。而我们从事的这部《赵国史稿》的写作,不过是想部分弥补上述赵国史研究的遗憾,同时期望以它引起人们对赵国史研究的注意。

四 赵国历史文化的几个特点

当这部《赵国史稿》完成之际,我们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赵国历史文化具有哪些特征?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这里不想面面俱到,仅选择其中几个要点进行分析。

和别的国家相比,赵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当是赵国史上一个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可以追溯到赵氏集团立国之前。赵氏之所以在诸卿族中脱颖而出,主要就是靠了它的军事力量。战国时期的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从兵员上讲,仅次于当时

的秦、楚二国,但楚国政治上腐朽,且较少参与中原的角逐,虽有众多的兵员,战斗力却赶不上赵国。赵在当时被称为“四战之国”;其民皆习于兵”,这使赵国的军事实力仅次于强秦。战国时期列国进行的改革,唯有赵国是主要针对军事制度进行的。战国后期,赵几乎成为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也主要是靠它的军事力量。赵国军事人才辈出,前有廉颇、赵奢,后有庞煖、李牧,甚至齐国的田单及燕将乐毅也一度到赵国为赵所用。以是,赵国军队屡次击破秦人。直到赵最后败亡前夕,还连败秦军于国门之下。

赵国军事力量的强盛,是和赵人雄健尚武的习性分不开的。此乃赵文化的典型气质之一。赵地少温柔敦厚之长者而多慷慨悲歌之士,人民少揖让而多功利,慊悍而少拘禁。从前司马迁论述属于赵的种(今河北蔚县一带)、代一带风俗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犷忮(强直之气),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慊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又论中山一带民风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犷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并言燕“大与赵、代俗相类,其民犷悍少虑”(《史记·货殖列传》)。总之,慊悍、强直、犷(狷)急、好气、任侠,便是赵地民风之写照。虽其顽劣者不免作奸犯科,乃至部分赵女亦习好“游媚富贵”;要皆属于“仰机利而食”,即依靠机智灵巧手段谋食者,与安分农桑因而重礼仪名节之民实大异其趣。至于这种风俗的形成,学者多归因于赵地所处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区相接的人文地理环境。这种环境造成了赵文化构成的两重性,即赵文化同时蕴含着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双重特征。由于赵人长期与北边少数部族相处甚至互相融合,边地少数民族的强悍与尚

武精神不能不浸染赵人；另一方面，赵人与他们不时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促使赵人提倡武备，崇尚勇武。不过，这种分析似仅适于说明种、代一带‘地边胡，数被寇’的赵地的民风，对于邯郸及其邻近地区‘仰机利而食’的民风，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或许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及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给予此地的影响更甚一些吧。

实际上，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也是赵国历史文化的特征之一。赵既有素称发达的农业，邯郸及太原盆地两地区是著名的农业区，史称‘邯郸之仓廩实’；‘粟支十年’，可以为证。又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经济，代地即为著名的农牧业兼营地区。‘代马’名闻天下，苏厉说赵惠文王，称代马、胡犬与昆山之玉为赵之‘三宝’。《史记》记李牧守代，为诱使匈奴出战，尝‘大纵畜牧，人民满野’。而其西北方向故林胡、楼烦地区更是典型的游牧区。至于赵国工商业之发达，在列国恐怕亦是数得着的。前面已对之略作介绍，仅就其中的冶铁业来说，赵国铁器无论在产品的数量上，还是质量的精良上，在列国中都可以称得上是上乘的。文献记邯郸郭纵以冶铁致富，卓氏亦以冶铁富。可知赵国的冶铁业作为商品生产的主要行业实已具有相当规模。凡此，均见赵国广大领域内，存在着各种成分的经济，这在列国中应是比较特殊的。

与之相联系，赵国民族结构的复杂性亦颇引人注目，原晋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戎狄之民实环之’，赵所据有的晋北地区尤盛。分晋后，赵继续奉行向戎狄地区开拓发展的政策，由代戎建立的代国首先入于赵国。赵武灵王伐灭中山，又占有了这个白狄建立的国家。尔后，赵‘西略胡地，至榆中’，又当有部分林胡、楼烦之民入于赵国统治之下。可以想见，赵国版图内的民族成分必然多于其它国家。这也势必影响到赵的内外政策。学者尝论武灵王之胡服，实含有与胡人打成一片的意思。事实上，赵还有许

多政治军事举措都是与赵国这种特殊的民族结构有关的。

最后，赵国学术思想的特点尤需一提。前言赵地涌现出众多有影响的大师级学者，颇为引人注目。然仔细分析赵地出生的学者的理论主张，却发现他们多具有追求法治或势治的思想倾向。慎到的势治理论自不必谈。荀子虽号为儒家，实际是引法人儒或内法外儒的思想家。至于公孙龙等人倡导的名家学说，学者早已指出，战国名家与法家思想，较别的思想流派来说，实是比较接近的。即如公孙龙子提出的‘审其名实，慎其所谓’‘正名实以化天下’的主张，便包含着许多法家奉行的‘循名责实’理论的意味。其他由赵人撰写的学术著作，有《毛公》，属名家；有《处子》，属法家；有《庞煖》，属兵家；有《虞氏春秋》，虽《汉书·艺文志》以之入于儒家类，然亦保不住属于《荀子》那样的儒家著作。要之，在赵国似乎很难找到鼓吹温柔敦厚、忠信礼让的纯粹儒家理论。联系赵国社会实际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在洋溢着雄健强悍习性与崇尚功利而少禁忌的赵国民人面前，以及在多元经济与民族结构的条件下，显然讲求法势比讲求儒术更切合治理国家的需要。在这方面，同为嬴姓祖先后裔的秦赵二国似有许多相通之处，尽管秦国是一个没有学术而必须从外地引进治国人才的国家，赵却是一个向国外输出自己学术的国家。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同其他几位本书的写作者赴邯郸作实地考察。漫步赵王城废墟的荒草地上，登龙台基址，远眺昔日邯郸各处胜迹，不免心生感慨。占得七律一首，权为本书叙言之结语：

台址连绵入莽荒，滏阳河畔起阿房。

太行为枕漳濯足，东夏来朝胡入享。

主父威风今难再，王迁幽缪古无双。

郭开构难武安死，一样贪赃致国亡。

第二章 赵国地区的自然 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历史舞台，它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黑格尔在谈到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形成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①当然我们并不赞成环境决定论，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形成来说确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对此，马克思也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外界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②他认为尤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越往早期越是如此。鉴于环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赵国史也将从它赖以生存的环境谈起。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0页。

在谈论赵国的环境之前,有必要简单交待一下赵国的疆域,因为这是谈论赵国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前提。三家分晋以后,赵国分得了晋国的东部和北部的领土,经历了赵简子、赵襄子、赵献子、成侯、肃侯等几代君王的努力发展,到赵武灵王和惠文王时期,赵国的疆域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大范围,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强国。赵国西部越黄河与秦为邻,南有漳河与魏国为邻,东有清河与齐为界,北有易水与燕接壤,西北傍阴山筑长城与匈奴、林胡、楼烦接界,疆域包括了今河北省整个太行山东麓以及相邻的广大平原,山西省中部、北部、东部地区,陕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土默特、乌拉山和呼和浩特市卓资县以北的广大地区,当然其中也涵有中山国的疆域在内。我们所要探讨的赵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就是指这一地域而言的。

一 赵国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赵国的地形特征及资源状况 赵国的疆域辽阔,地形条件复杂多样,我们根据赵国疆域的特征,把赵国划分为四大地形区。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把赵国分割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为河北平原,西部为山西高原(含山脉及山间盆地在内),这两个地区是赵国政治和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此外,冀北、冀西北山地(含山间盆地)和内蒙古高原,则为赵国另外两个地形特征明显的地区。

河北平原区位于冀西、冀北山地和渤海之间,在构造体系上属于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的第二沉降带,在地质时代,经历了多次的沧桑变化。整个平原地势不高,海拔多在百米以下,低于 50 米的占绝大部分。河北平原由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水系冲积而成,根据其形态和成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山前冲积平原、中部冲积平原和

滨海冲积平原。赵国主要的政治中心就位于河北平原的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即太行山东麓的冲积平原上。山西高原位于太行山西侧，由东部山地(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西部高原山地(以吕梁山为骨干)和晋中盆地(太原、大同等盆地)三区组成。其中太原盆地是先赵族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它位于汾河流域中一系列小盆地组成的川地的中间地带，东西宽 50 公里，南北长 150 公里，海拔 700—800 米。太原盆地属中生代以来的断陷地带，是汾河断陷川地的一部分，历史上称之为“并州”。

冀北和冀西北山地区是一个由华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过渡的山地和山间盆地组合而成的山区，它是由数列东北、北东转向的地垒型的平行山岭组成，山间夹着许多狭长的地堑式盆地。东段是震旦系的石英岩和侏罗、白垩、第三纪的砂砾岩、火成岩组成的丘陵群；中段以军都山为轴，由几列不连贯的平行山脉组成；西段则与山西高原的北缘山地相接。冀北和冀西北的山间盆地多属构造盆地，这些盆地由黄土和黄土状的沉积物填充，是冀北山区重要的农耕地区和人口集中区。

冀北山地再往北就是内蒙古高原，这里是广阔的草原区，战国时期这里是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经常活动的地区，也是当时赵国北部边境所达到的最远地区。

在这四大地形区内，主要的河流有黄河、汾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战国时期，黄河流经河北东部地区，由今天津渤海入海。^①据《尚书·禹贡》记载，黄河从今天巨鹿西北的大陆泽开始，向北分成九条支流，然后又合成一条河，流进大海。由于黄河经常泛滥，因此影响了河北东部平原上古人类的活动，从而使

^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

古人类多活动于沿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冲积平原上。汾河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流经太原盆地,它在赵国早期的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漳河、滏阳河流经邯郸地区,对赵国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使邯郸‘仓库实’(《国语·晋语九》)的重要条件之一。桑干河流经大同盆地、宣化盆地,是赵国西北部重要农业区的所在。滹沱河流经中山国,中山并入赵国后,这一地区也成为赵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和手工业、商业区之一。

先秦时期,赵国境内的湖泊要比现在多。最著名的为大陆泽。大陆泽又名巨鹿泽、广阿泽,位于河北平原西部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处,《尔雅·释地》称其为七薮之一,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大湖。此外,在这一地带还有许多湖泊,据文献记载,有位于今河北永平东的鸡泽(《左传·襄公三十六年》),位于河北曲周县北的泚泽、海泽(《山海经·北山经》),以及位于河北宁晋县东南的皋泽(同上)。太原盆地也是湖泊广布,据《水经注》卷六记载,有汾陂、邬泽、祁薮、文湖、淳湖等。《汉书·地理志》称:‘九泽在北,是为昭余祁,并州薮。’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陂泽连接,其薮有九,故谓之九泽,总名昭余祁。’昭余祁位于今山西祁县西南,介休东北,方圆数百里,是古代晋中盆地最大的湖泊。这些湖泊由于自两汉以来黄河挟带泥沙的淤积,加之人为疏凿河渠沟洫、截断湖泊的水源,再加上北方气候逐渐变得干燥,所以今天这些湖泊早已湮没不见了。但这些湖泊在当时引水溉田发展农业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赵国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铁矿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据《山海经·五藏山经》的记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山计有三十七处,其中一部分分布于今天山西盂县和蒲县等地区。赵国都城邯郸附近也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其中红山矿、矿山村矿、凤凰山矿都是邯郸著名

的铁矿。冀西北的云烟、龙关铁矿也是赵国境内的富铁矿。这些铁矿资源为赵国冶铁业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赵国地区上古时期的气候特征及植被状况 竺可桢先生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中丰富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把我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即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1100 年的温暖期(考古时期),公元前 1100 年至 1400 年的寒暖交替期(物候时期),1400 年至 1900 年的寒冷期(方志时期),以及 1900 年以来的气候波动期(仪器观察时期),而且每个时期内又有着不同的变化特点。^① 根据这一划分,赵国地区在其灭亡之前的这一时期内大致经历了三个气候变化期,即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1100 年的温暖时期,公元前 1100 年至公元前 850 年的短暂寒冷期,以及公元前 770 年至春秋、战国、秦汉的温暖期。从总体上看,大致是一个温暖—寒冷—温暖的变化过程。受这一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赵地的植被状况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变化特征。

史前时期,今华北全境大部都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森林覆盖,由于当时华北的湖泊较多,因此沼泽植被也分布广泛。冀北山地的西段、晋北、内蒙古高原的中部一带,为植被较好的草原地带。而冀北山地的东段和南段,无论从地表形态还是自然景观各方面看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过渡类型。到了先秦时期,华北的植被状况发生了不少变化,殷墟时期这里仍有大片的森林和沼泽存在,晋陕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和太行山一带,也分布着大片的森林植被。但西周时期由于气候的变冷,森林面积已减少了许多。至春秋战国时期,人工采伐及战争的增多,使这一地区的植被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赵地的这一气候特征及植被状况,对赵国经济类型的形成

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